

逆流而上：底层学生的阶层跨越之旅

◆阳科峰 刘雪君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社会再制的功能而非社会流动。本文从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维度来对底层学生所处社会不利地位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据此探讨底层学生实现自身跨越的勇气来自阶层跨越的拉力和父母具身化生活实践的推力。

关键词：底层学生；再生产；阶层跨越

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现阶段我国就业市场的筛选机制愈发地呈现出柯林斯所言喻的文凭社会的特征，也即是劳动力的雇佣者不仅仅关注劳动者是否具有工作相关的能力，而是更加注重把文凭作为筛选劳动者的工具，关注文凭的质量和层次^[1]。不同类别、专业、质量的大学教育也就成为了分流众多大学生的重要判断标准，而底层大学生也即是出身寒门的大学生（与西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概念相对应）进入何种大学、接受何种专业的教育、同时获致何种教育发展也即是我们今天关注底层学生之社会流动问题的全景视角。

一、再生产视域下的高等教育

在针对高等教育扩张对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研究中，西方学者普遍注意到，尽管教育扩张可以使底层家庭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在较高水平和质量的教育上，社会阶层的局限依据明显。其中西方学者麦克尔对于高等教育教育扩张影响的研究中提出了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设（MMI假设），也即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有在满足了优势阶层的需要之后，才会向逐渐向其他阶层开放。相对应地，在中国学者刘精明对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3年的高等教育数据实证研究中，其也发现，基于地位取向的本科教育更多地满足了优势阶层的需要，而生存取向的成人教育则更多地向下层社会群体开放^[2]。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扩招并非均衡地满足了学生们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要，而是具有阶层差异性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供给。

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对于专业及就业市场的认知与选择以及大学阶段的适应和成长是底层学生如何在高等教育阶段进一步实现自身阶层跨越的关键一步。布迪厄指出，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不是兴趣和努力，而是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越低，其专业选择可能越受限制，这种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出身的女生最为不利；相比起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人的子女，工人和农民的学生选择师范类和文理科等收入回报比更低的专业的比例更大^[3]。同样地，在进入大学阶段以后，底层学生依旧处于不利的境地。在秦惠民、李娜对于北京某985大学农村学生的调查之中发现，出生农村的大学生在具有学术场和权力场双重属性的大学场域之中更容易产生复杂的位置感和怀疑感，因而更容易对于高等教育产生质疑从而在大学竞争之中落败^[4]。而大学阶段的专业选择和学业成就又决定了底层学生能否获得高一级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入场券，也即是在劳动力市场筛选的过程之中增加自己的砝码，从而提升阶层跨越的可能性。高等教育阶段底层学生的弱势地位也就可能进一步积累，成为其失败的又一根稻草。

钱民辉在针对中国教育形态的总体评价中指出：在今天，性别依旧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出身环境的影响尤甚于性别，社会流动中重视自身文化资本的显规则作用已经弱于出身时就已确定的先赋性特征^[5]。而社会对于先赋性和后致性何者更加重视的判断标准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流动程度的关键依据。一个社会愈重视自致因素，说明这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率更高，心态也更为开放。吴愈晓在对城乡教育机会差异的实证研究中发

现，初中城乡升学机会差异没有显著变化，但高中和大学的差异却呈现扩大趋势，教育的阶层获得差异依然没有得到改善^[6]。总体性地审视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我们可以审慎地说，相比起改革开放初期，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功能形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社会再制而非是社会流动的功能。

二、底层学生教育不利地位的成因分析

当我们视野集中在底层学生为何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致、大学专业的选择、乃至大学阶段的学业成就等方面呈现出来综合性的弱势地位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去经典的布劳、邓肯社会经济因素模型（ISEI）之外，底层学生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惯习和匮乏的社会网络关系或许也是其在教育中容易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关键性因素。

（一）社会经济因素

美国学者墨顿认为：科学界中的学者的声誉积累是存在着累积效应的，其将之称为马太效应^[7]。而引入这样的观点考察教育中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时，布劳及邓肯则明确地指出，随着时间的成长和延续，贫富家庭、单双亲家庭之子女在教育上的获得的差距会进一步的加大，从而形成教育上的累积效应。底层学生家庭经济地位上的缺乏对于其教育获得上的影响是综合而广泛的，其中包括底层学生初次学校获得层次上的差距、底层学生能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自己的学业而不因家庭经济因素而辍学、其能否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以获致更高的教育回报、其能否支付昂贵的出国学习和交流费用等诸多因素。而其中如初等学校的质量等早期因素随着教育的累积效应会更为明显地作用于学生个体，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影响学生的学业信念、认知乃至学业成就等。

（二）社会网络资本

林南教授和其学生边燕杰教授在对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人情，针对性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网络资本中强关系对于办成事情的重要性。而在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走人情托关系进优质学校、安排工作等现象无一不依靠人际关系中的强关系。相比起优势阶层较高的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相比，底层家庭在以上三个维度上都处于对应的劣势地位。而又因为其较为底层的社会地位，底层家庭很难跨越阶层建立具有强关系作用的社会网络帮助在学业、就业上帮助其子女。边燕杰也在研究中提出：即使取得了相对应的大学文凭，但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户籍身份依旧会成为其在职业市场上机遇、收入等诸多方面的局限^[8]。这就使得底层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难以与同等学业水平的优势阶层学生进行竞争，从而更易产生心理失衡和结构性的不公平感。

（三）文化资本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布迪厄针对底层学生学业失败提出：底层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缺乏学校文化之中占据主流位置的高雅文化资本。缺乏主流文化的底层学生在校中或是格格不入，或是被间接排斥，因而自然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失败。而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之中也显著地发现，文化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交替影响，进而将自身的优势进行代际传递，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因此，底层学生不但容易在经济上处于匮乏的状态，同时在大多数学校“城市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产生发自内心的深深自卑感，在与同学交往之中产生敏感、羞怯、退让等心态，也就不论基础教育抑或者高等教育中相对其他学生不敢追求自身应该争取的机会，从而因为心态上的敏感而更容易在竞争之中落败。

三、逆流而上：底层学生阶层跨越之旅

事实上,在论及了底层学生在社会经济因素、文化资本乃至社会网络资本等诸多不利处境的境况中,突破结构性的因素的桎梏也就需要逆流而上、不断跨越障碍的勇气。事实上,梁晨在对从1952年到2002年顶尖学校北京大学和地方性综合院校苏州大学的学生学籍卡片进行考察之后发现,高等精英学校的生源的特点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其称之为“无声的革命”^[9]。也就是说,依然有部分底层学生通过发挥自身努力考入重点大学、取得高学业成就。当然这一过程,自然也言喻了无数令人心酸的勇气。这一勇气的构成,也就主要包括来自于对阶层跨越的期待而形成的拉力和底层父母用实际行动具身化实践而形成的推力。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中心从建国初期就集中在城市上,大量的资源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梁漱溟先生在建国初期曾对主席提出“九天九地说”,认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在工业,工人处在九天,而农民处在九地,国家对于工人虽然不能算遗弃,不算脱节,但多少有点。在21世纪信息化和社会分工更加明显的今天,除去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福利待遇的区别外,农村大学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自己在乡村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与自己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即是,这一代农村大学生已经回不去了。而在家庭传统文化资本的教育下,大多数底层学生早已谙熟了“知识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等言说,并把之作为自己努力奋斗,改变未来命运,实现家庭社会阶层流动,向上攀登的使命与信念,因而成为底层学生们所追求理想生活的拉力。

更为令人动容的是,底层学生从小耳濡目染的父母艰辛生活一遍遍地用具身化的行动告知他们,自己必须离开农村、离开底层,这成为底层学生离开自身所处环境局限的推力。眼见着父母或是一滴汗水摔八瓣地在地里工作,抑或是背井离乡去自身未曾谋面的地方打工以供养整个家庭的生活。就如同程猛博士曾在访谈中记录到一位农村大学生说到:“爸爸在宿舍门外摸着我的脸说,宝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10]。而事实上,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实现家庭经济状况乃至命运的改变,是推动着底层学生们艰难前行的动力。这种动力,中间夹着底层学生们将自身的学习视为道德任务的压力,因而也就使得底层学生更加强烈的追求自身学业上的成就,同时不能允许自己在学业上失败。

而要真正促进底层学生成功地实现自身的流动,打通社会流动的阶梯,让社会实现更为良性的运转,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城市与农村建设的问题上采取一个弱势补偿的态度以减轻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于农民、农村的损害,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学校教育环境之中要做到社会经济条件上的保障以保障底层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同时也要求我们从社会大的文化环境背景上尊重多元文化,避免文化层面上的帝国主义,从而造成文化上的区隔。

参考文献:

- [1]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9:45
- [2]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J].社会,2006(03):158-179+209.
- [3]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3,224.
- [4]秦惠民,李娜.农村背景大学生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大学场域中文化作为资本影响力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2(04):72,85.
- [5]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04):194-200.
- [6]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英文)[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3,34(03):58-75.
- [7]Merton R. K.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J]. Science,1968,159(3810),56-63.
- [8]边燕杰,肖阳.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01):1-7.
- [9]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01):98-118+208.
- [10]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04):83-91.

作者简介:

阳科峰(1997年6月-),男,汉族,湖北天门人,本科学历,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刘雪君(1998年11月-),女,汉族,黑龙江肇东人,本科学历,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本文课题项目:黑龙江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底层文化资本的再应用——基于对H大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810212012】。

